

壹、緒論

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西化歷程，是從晚清仿日歐，到民國轉向仿美，一般學者多將焦點放在1909年美退還庚子賠款成立遊美肄業館（蘇雲峰，1996）、1919年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訪華與實驗主義傳入（肖菊梅，2011；周谷平，1996）及1922年改定「新學制」（錢曼倩、金林祥，1996）上，但是對於19世紀前期的中美教育交流卻很少關注。事實上，前述變化並非一夕間突然發生，而是長期往來的結果。

清道光23年（1843）中英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後，西方勢力湧進中國。24年（1844）簽訂中美望廈條約，美國政經宗教勢力隨之而來。咸豐8年（1858）與10年（1860）簽訂天津與北京條約後，不僅增加通商口岸，更允許外人深入內地經商傳教。面對外國挑戰，清廷遲至同治初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念下，才開始推動洋務運動，設立了個別的西式語言、技術與軍事學堂，但彼此獨立而未形成一套制度（徐宗林、周恩文，1997），且未確定專學何國。直到甲午戰敗，凸顯30年改革失敗，遂激起戊戌變法及辛丑新政全面仿日、改採西制的決心。前人對於仿日制定壬寅與癸卯學制（錢曼倩、金林祥，1996）及捨英制而仿日已有研究（周恩文，2017），儘管美國19世紀初即與中國往來，但對於早期中美文教交流及其教育的可能影響，僅見一書（張施娟，2010）。有鑑於此，本文將採史學方法，透過史料的分析，探討甲午轉折以前，中國對於美國教育的介紹及認識程度，進而做後續評估影響辛丑後頒布癸卯學制、庚款清華留美及民國11年仿美制實施新學制等變化的基礎。以下依序分析所用史料、內容，綜合討論，最後提出結論。限於篇幅，對於報刊雜誌所述及教會學校設置將另文再談。

貳、研究史料的分析

本文所用的史料，主要是當時中外人士的論著，包括外國傳教士與清朝官民編撰的美國史地論著及清官民遊歷美國的紀錄。

首先，就史地論著言，目前所知最早介紹美國的書籍，是由英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¹牧師麥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於嘉慶24年（1819）在麻六甲出版的《地理便童略傳》。後有同會牧師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所編《全地萬國紀略》，原分載於嘉慶末道光初（1820-1821）之《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道光2年（1822）於馬六甲刊單行本，但兩書均無教育記事。普魯士牧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所編《萬國地理全圖集》說：「花旗國，一曰兼攝邦國，因船插星旗，廣東人謂之花旗，亦稱之米利堅，皆指一國也」（郭實獵，1897/1964，頁25-26）。之後徐繼畲沿其說。郭書中略述教育，其書當成於道光17年（1837）後。後有倫敦會牧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外國史略》於道光27年（1847）刊印，書中略提到教育。

最早較詳細介紹美國近況及教育的書，是首位來華美公理會海外傳教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即美部會）牧師高理文（即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所撰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道光9年（1829），他奉派到中國傳教，10年（1830）春抵廣州（Lazich, 2000, pp. 54, 65）。該書於道光18年（1838）在新加坡由美部會堅夏書院出版。24年（1844），修改更名《亞墨理格合眾國志略》於香港出版；咸豐10年（1861），再修正並更名為《大美聯邦志略》（後簡稱《聯邦志略》）於上海出版。魏源於咸豐2年（1852）之《海國圖志》百卷本參考之。王錫祺（1897/1964）於光緒23年（1897）所編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再補編》（後簡稱《再補編》）收錄修改後稱《美理哥國志略》。

同時期清人所編書，最早介紹美國的是《海錄》。它是廣東商人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於嘉慶25年（1820）出版，但未提及教育。官員所編書，最早當屬前欽差大臣林則徐於道光21年（1841）編譯成的《四洲志》。後內閣中書魏源以林書為基礎，再行蒐集與補充而成《海國圖志》，50卷本成於道光22年（1842），24年出版，27年增至60卷，之後再參考徐繼畲《瀛寰志略》及其他資

¹ 本文所有人名、地名之英文係作者查補。